

□ 孙海鸣

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一、经济发展阶段与增长方式:要素替代分析

经济发展的基础是经济增长,各种类型的结构变动,是增长的衍生物或逻辑结果。虽然,结构变动的优劣,会影响经济增长的数量或质量,但是,它不会影响经济增长是财富积累主体来源的基本趋势。因此,经济发展通常被视为经济增长的函数,而经济增长也构成了经济发展所要实现的最为重要的目标。这样,在那些存在特定的机制使各类结构对经济增长保持高度敏感性的国家中,研究经济发展问题实际上等同于研究经济增长问题。而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发展经济学,之所以强调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非同一性,其原因在于,在大多数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中,尚不存在因经济增长而引致结构变迁的传递机制,使分配结构与消费结构未得以相应的改善,从而产生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现象。但是,在增长与发展的逻辑关系上发展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并未存在差异。福利经济学所反对的经济发展中的增长中心论,实际只是揭示了在发达国家中,依靠传统的市场机制,在承担增长引致结构理性变迁中出现障碍。其本质是发展中的市场失败而不是增长失败。

由此可见,当经济增长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时,采用什么方式实现增长,就成为辨别经济发展所处阶段的重要评估参数之一。当然,应该强调的是,它并不是区别经济发展阶段的唯一评估参数。

经济发展阶段论或经济发展阶段学说,是经济发展理论的一个重要领域。经济史学家概括和划分经济发展阶段,是为了揭示经济发展的规律,总结不同历史时期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分析造成不同历史时期经济发展呈现不同特征的原因,以及评价不同阶段的经济绩效和阶段跨越的历史动因。发展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发展阶段,则更多地是建立在总结发达国家或其他国家经济发展过程和经验基础上,结合后起国的实际情况,来为工业化与现代化战略设计,和政府政策制定服务。在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上,亚当·斯密首先将以往历史,划分为“狩猎社会”、“畜牧社会”和“农业社会”。德国历史学派的代表李斯特,则在亚当·斯密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农工业社会”和“农工商社会”两个阶段。这种划分,基本采用的是从生产或供给角度的评估方法,以一定历史时期占支配地位生产方式和由此形成的支配整个经济的产业为依据。其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所存在的支配性产业的替代轨迹。以现代经济理论为分析背景的罗斯托,则从生产、组织、制度和消费等综合角度,来揭示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他把经济发展划分为六大

阶段:①传统社会;②为起飞创造先决条件的阶段;③起飞阶段;④成熟阶段;⑤高消费阶段;⑥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阶段。这样的划分,由于缺乏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有关发展的支配性力量的分析,使其学术阶段大于实证战略应用价值。工业经济学家则通过工业结构的变动为依据,来划分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发展阶段,他们认为:工业的发展大体经历四个发展阶段:①以一般消费品为主的轻纺工业发展阶段;②以原材料工业为中心的重化工业发展阶段;③以高附加值工业为中心的深加工工业发展阶段;④技术和知识密集型工业发展阶段。

上述经济发展阶段的分类,虽然隐含着经济增长方式决定的含义,但是,他们大多是从增长的结果所诱发的结构变动角度,来揭示发展阶段的具体特征,而对促成人均产量提高的经济增长方式,其自身内部要素的增减与结构组合,与经济发展阶段的关系,则分析甚少。也就是说,是怎样的要素及其结构组合,形成了“狩猎社会”或“后工业化社会”?是什么原因导致一个发展阶段中,占主体地位的能带来人均产量提高的增长要素及其组合方式,被另一个发展阶段的增长主体要素及其结构组合所取代?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实际上就引申出经济增长方式理论。对于从事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和设计的经济学家来说,分析经济增长方式,更有利于制定计划与政策。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中,导致财富增长的是生产方式,即在一定生产关系条件下的生产力诸要素的合理组合。在这里,马克思揭示了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即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之和)之间,所存在的由生产的技术水平的差异所决定的比例关系,并将劳动力所能推动的生产资料而导致增长的比例关系,定义为技术构成。当技术水平在历史考察中,被作为最活跃的革命性因素而成为生产增长的前提时,劳动力与生产资料之间的技术构成自身,就存在着后者不断替代前者的趋势。而在这一替代过程中,两者之间比例关系的不同,就决定了生产增长方式采取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生产力诸要素之间的替代,是增长方式形成不同形式的决定性因素。

自20世纪30年代科布和道格拉斯创立生产函数的理论和分析方法之后,经济增长理论在凯恩斯政府干预理论盛行的背景下,获得了极大的发展。首先,希克斯在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引入了导致生产增长的技术进步因素,并建立了中性技术进步理论,即在劳动与资本组合的技术系数不变的条件下,技术进步可以在不影响劳动与资本的边际产出的情况下,独立地导致产量的增长。根据这一假定,生产函数就可表述为: $Q_t = A_t F(K_t, L_t)$ 。其中, A 代表技术进步, t 代表时间。随后,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率先将生产函数引入宏观经济增长分析中,建立了总量生产函数模型,其表述式为: $Q = F(K, L, t)$,其中, Q 为总产出, K 为资本总投入, L 为劳动总投入, t 作为时间变量被用来表达技术变化。丹尼森、乔根森和格里里彻斯则开创了增长因素的经验分析,并将实际产品增长率与实际要素投入增长率的差额,定义为总要素生产率。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的稀缺性,是由其所具有的相对价格来反映的。如在存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发展中国家中,劳动力的相对价格比资本的相对价格低。这就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通常以建立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中心的重要原因。当然,在人口稀少的古代社会,人口资源比土地资源更为稀缺,则此时的农业增长,更多地是采取扩大耕种面积的粗放方式,而不是以密集劳动力投入的精耕细作方式来实现。由此可见,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推动经济增长的要素的稀缺程度不同,各种增长要素之间在使用上的相对优势也不同,由此产生不同的要素替代率,供经济行为主体为实现经济生产的目标而进行选择。当然,要素

的稀缺程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即使是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会随着就业率的提高而上升;人口增长也会使原先富裕的土地和初级矿产资源变为稀缺;而技术进步与生产效率的提高,则会使技术装备的稀缺性下降,这都会导致生产要素的内部结构发生替代性变化。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增长方式的要求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具有比较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特征,其主要表现在:第一,整个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农业来带动,在1949年的社会总产值构成中,农业产值占60%左右。而当时农业的生产方式,主要采取的是家庭式劳力、畜力与土地的结合,农业资本装备率基本为零;第二,农业人口占全社会人口的90%以上,城市化率不足10%,城市工业产值仅占社会总产值的25%。在城市工业中,轻重工业的比重为2.8:1,基本处于霍夫曼所分析的消费资料工业占主导的工业化第二阶段;第三,地区发展的结构失衡,近、现代工商业和服务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少数大城市,如上海、天津、广州等,广大内陆地区尚未引入工业化时代的生产方式;第四,人口增长与土地资源有限的矛盾已初露端倪,部分农业地区出现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现象,导致大量破产农民涌入沿海大城市;第五,当时的中国,即缺乏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也缺乏发展近现代工业所需要的技术。

显然,在这种条件下,根据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经验和走过的道路,中国应采取与中国所具有的初级劳动力丰富的优势相适应的经济增长方式,如在农业中,应推行更多使用劳力的集约型耕作方式,在工业中应着重发展能更多吸收初级劳动力就业的轻纺工业。然而,集约型农业耕作方式需电力工业、机械工业和化学工业的支持,轻纺工业需要装备和技术。因政治上的分歧,中国除与前苏联及其集团保持良好关系外,与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中断了经济联系。这就使中国获取发展所需的技术和资金来源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致使中国不得不走上一条为加速工业化立足提高装备自给率的工业化道路。在实现意识形态设想和解决准封闭环境条件下的自主发展等双重因素的影响下,中国模仿前苏联,建立了集中动员资源能力极强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走上非市场化的经济发展道路。为快速推进工业化的进程和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中国的计划管理部门,通过为各种资源和要素制定计划价格的方式,重新确定了资源要素和产品的相对价格体系,形成了工业产品特别是重工业产品价格高利大而农产品相对价格低廉的利益机制。从而在计划和利益两个方面,改变了全社会资源的配置机制,形成了与一般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初期阶段所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

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发展计划,引入了以重化工业为中心的增长方式。在“一五”时期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农业只占7.1%,轻工业只占6.4%,而重工业却高达36.1%,其投资额分别是农业的5.1倍和轻工业的5.6倍^①。重化工业的生产方式,主要依赖资本装备要素和技术要素的投入。这实际上就意味着,中国在尚未完成劳动密集型轻纺工业发展过程之时,跨越式的进入重化工业发展阶段。到“一五计划”完成期的1957年,农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949年占70%下降为占43.4%;轻工业总产值从22.1%上升为31.2%重工业总产值从7.9%上升为25.5%^②。当然,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与前苏联提供技术、装备和人材密切相关,他们援建的156个大型项目,初步奠定了中国重化工业的发展基础。然而,由于未能充分发展轻纺工业,而使之难以承担提供重化发展所需资金积累的功能。在有限地接受国外资金(向前苏联借债)的同时,我们不得不制定了压低农产品价格、提高工业品价格的价格“剪刀

差”政策,以从农业中获取工业化初期所需要的“启动资金”。这一增长方式,实际一直持续到80年代,重化工业一直是基建投资的主要对象。到1979年,农业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下降到29.7%;轻工业为30.7%;重工业则上升到39.1%^③。

这种经济增长方式,虽然起到了快速形成我国独立完整的工业结构体系的效果,但也对我国农业的发展,造成了较为严重的负面效应。其主要表现在:第一,工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使生产要素合理流动的信号机制遭到破坏,致使农业因缺乏投入而难以形成集约化生产经营方式;第二,农村收入水平提高缓慢,农业人口的相对购买力下降,使工业陷入自我服务、自我循环的境地,也使工业化的社会效应难以扩散到农村;第三,农业生产方式相对停滞,使农村隐蔽性失业人口大量产生,农村不仅成为自身剩余人口的蓄水池,还成为容纳城市过剩人口的缓冲地。致使在1952年到1978年的26年中,我国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仅提高2.6%;^④第四,强化了中央集权的农业经济管理制度与城市户籍制度,以阻止剩余劳力涌向城市。这样,农业的增长方式,除生产组织形式从家庭转向集体的变化外,其增长要素的内部构成,并未发生明显的资本和技术替代劳力的状况。土地和劳动力依然构成农业增长的两大要素。

80年代前,优先发展重化工业的经济增长方式,虽然在重化领域中引入了新的增长要素组合,也形成了中国经济新的、更多使用资本和技术的增长源泉,但它却基本上是以减缓农村种植业增长要素替代进程为代价的。其后果是,在中国经济发展中,非但未能消除在1949年前就已形成的二元结构,同时还有所强化。更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以综合行政管理的手段阻滞了农村生产要素向城市工业的流动,使利益引导所诱发的要素之间的竞争,难以真实体现在城市工业增长的要素替代机制之中。这样,相对先进的工业增长方式,与落后的农业增长方式互相独立且长期并存。当城市工业内部迅速发生资本和技术对劳动进行替代导致工业结构发生巨变时,全社会以就业结构衡量的工业化率依然处于较低的水平。

80年代后,引入市场机制与对外开放,使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发生重大变化。首先,随着计划价格体制与计划配置资源体制的逐步解体,由稀缺性所反映的生产要素的价格,进入逐步真实化的过程,生产要素随利益导向自由流动的机制也开始逐步形成,从而使各类生产要素依比较利益的原则,进行组合和创造要素竞争机制成为可能;其次,对外开放所导入的国外市场信息和发展空间,逐步改变了国内在封闭时期所形成的、对各类生产要素稀缺程度的评价,使生产要素的稀缺性判断,被逐步置入国际经济体系的环境中。这样,要素价格形成与决定增长要素结构组合的要素竞争机制的形成,开始深受国际市场的要素相对价格与竞争机制的影响。因此,80年代后的中国经济增长及其增长实现中所出现的要素替代,开始重新进入了市场牵引的过程。

市场信号及其机制引入后的80年代初,中国经济具有几个基本特征:第一,与人民生活直接相关的农产品与轻纺工业产品长期供应不足,为防止物价上涨而不得不采用配额票证的方式来限制消费;第二,优先发展的重化工业,由于受其规模和技术上的限制,还难以承担推动和支持农业与轻工业资本替代劳动、先进技术取代落后技术的职能,而仅能承担支持外延式基本建设投资的职能;第三,与城市化相关的社会资本投资长期不足,使城市基础设施难以承受城市人口自身的自然增长,从而使城市经济的外部负效应充分显现;第四,从封闭走向开发所导入的外部信息 and 产品,使中国人民的消费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传统的城市工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开始暴露出与变动的消费结构不相适应的矛盾。

因此,80年代后,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发生了如下两个方面的重大变化:第一,乡镇工业

高速发展,并由此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工业化模式,在世界上,创造了工业化率的提高并未与城市化率提高相伴随的特殊范例。同时,在广大的乡村区域中,引入了新的生产要素投入组合、产出组合和生产分工与组织形式。在传统的经济发展理论体系中,乡村与城市存在严格的产业分工,乡村生产要素竞争的比较优势,通常被界定在农、林、牧、副、渔等第一次加工产业,而其现代化主要表现在采用由城市工业所提供的技术装备、化学手段和动力装置,使农业生产方式实现集约化,使农产品生产的要素投入组合中,提高资本要素的比重与贡献率,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节约下的劳动要素,将被城市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所吸纳。中国的特殊性在于:乡镇工业是在我国广大农村的土地上,在并未直接享受城市聚集效应的前提下,利用农村有限的货币资金和农民的结合,所生成的具有竞争力和成长性的工业性增长方式。乡镇工业的总产值,从1978年的385亿元,上升到1994年的32336亿元,其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9%,上升到1994年的42%^⑤,应该说,当工业增长方式大规模进入乡村地带时,我国农村作为第一次产业的农业的集约化生产与技术现代化过程,因缺乏资本积累而尚未全面启动。此时,农业生产主体却选择发展工业而不是推进农业技术的现代化,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归纳起来主要有几个特殊因素在发挥决定性作用:①以“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为代表的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使生产主体获得有限的选择自由,同时也使原由集体生产所掩盖的劳动力大量剩余的矛盾充分暴露;②城市的户籍制度与市场经济发育不足,限制了农村劳力流向城市;③轻纺工业产品长期供给不足产生了强烈的市场需求信号,而城市社会资本投资不足所产生的外部负效应,使有限的城市空间配置能满足市场需求的企业,成为须承受高昂经济社会代价的行为;④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使企业具有依市场规则销售资本装备、原料和建立零部件配套协作生产体系的权力。这样,在工业品的相对收益高于农产品的价格机制依然存在的条件下,农业生产主体认为,其所掌握的生产要素进入工业并形成工业增长方式,比投入农业从事集约化经营,更具竞争优势。当然,这一选择,实际上也符合收入弹性大的选择基准。工业产品市场消费规模,随国民收入提高而增加,确保了乡镇工业的持续发展。而未能享受城市聚集效应所出现的效率损失,则被城市工业在改革过程中承受高额制度运行费用所抵销。

第二,在发展乡镇工业进行工业化“补课”的同时,由于对外开放的扩大,国外技术和先进的管理,开始进入中国的经济体系,并成为改造增长要素素质、调整增长要素结构组合的重要来源。技术进步推动工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工业结构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三大技术环节及其由此体现的三种类型。这三大技术环节是产品技术→工艺装备技术→管理技术。产品技术是与产品形成相关的研究、设计、开发、试验、测试、仿制技术的集合;工艺装备技术是生产工艺设计、工装设计和制造、设备设计和制造等项与产品制造过程相关的技术集合;管理技术是批量生产组织、社会协作组织和外部营销技术等管理方法的集合。依技术来源的不同,我们可将工业生产中的技术进步,分为三种类型:①自主开发产品→自主开发工艺装备;②自主开发产品→引进关键工艺装备;③引进产品→引进装备。在50年代到70年代这30年中,除50年代重化工业中,全盘引进前苏联156个大项目外,其他工业的技术进步,基本采取了第一和第二种技术进步的方式。50年代着重推进产品的研制开发,60年代着重推进工艺装备技术的完善并形成批量生产。然后,围绕50年代改造的老产品与开发的新产品,以其产业关联性所导致的原料、设备和零部件配套要求,牵引到中、上游的机械、冶金和化工工业的发展。80年代后,工业技术进步的方式发生了从第一、第二种模式,转变为第三种模式的根本性变化。对国内没有的大类消费型产品和原料型产品,及其产品制造的工艺装备,采取了全盘引进的模式。产品阶段

的技术进步和工艺装备阶段的技术进步,简单成为引进的结果。同时,对原有产品的技术改造,也在不同程度上推行了全盘引进的方针。由此快速建立了与消费需求相适应的消费类电子产品生产体系和家用电器产品生产体系,并使传统产品的技术水平迅速向国际水平靠拢。应该说,技术引进对 80 年代我国工业增长方式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具有决定性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技术引进相对于 50 年代到 70 年代所形成的工业技术体系来说,是属于外来嵌入式产品和技术,与原有的技术基础无法直接溶和。更由于引进的节奏过快和分布过广等因素,使消化吸收、产品系列化发展,和原料、零部件的国内配套,滞后于引进的速度。这样,在 80 年代中,外来嵌入的技术和产品,未能对原有的技术基础和工业结构产生广泛的波及效应,也未能在国内为之建立完整的配套生产体系。其结果是,下游技术和产品的引进,逆向推动中游和上游技术和产品的引进。工业增长方式和工业结构的转变,就成为单纯引进技术的结果。

三、经济发展新阶段与增长方式转变

90 年代初、中期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其主要特征是:第一,食品、日用消费和耐用消费品的生产与消费,在城市中大体实现供需均衡,内地农村虽然耐用消费品的消费率因受收入水平的限制依然较低,但在食品和日用消费品领域,也基本能实现供需均衡。除非大规模提高内地乡村农民的收入,否则,继续依靠日用消费品和耐用消费品扩大生产规模来带动经济增长,已相当困难。第二,城市经济,已开始进入通过扩充社会资本投资、改进基础设施水平,以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新一轮城市化时期;沿海富裕的乡村地区在脱贫和乡村工业化的基础上,开始进入以城镇社会资本投资为中心的乡村城市化时期。第三,随着沿海地区产业的升级和能量的释放,沿海发达地区向中西部劳力资源密集和自然资源密集区域转移产业的浪潮开始兴起,使中西部地区为引入工业而进行基础设施开发建设,以及同沿海地区进行经济联系的基础设施建设,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第四,沿海城市工业,在前 10 多年技术引进的基础上,已在日用消费品和耐用消费品生产领域,初步完成了学习过程,而开始进入重建产品技术研究开发体系的阶段,同时,技术引进的重点,已开始转向信息技术及其载体,和现代服务技术。第五,市场经济的体制已初步确立,各类生产要素由其稀缺性决定价格的机制已初步形成,生产要素内部结构的形成和要素替代,已基本成为由比较利益所决定的要素竞争的产物,计划配置资源所造成的扭曲,已通过 10 多年的渐进改革与发展,而基本被纠正。第六,现代城市第三产业,已从 80 年代主要为日常消费服务的功能的基础上,增加了替代计划分配资源机制的、为生产和流通全面提供各类市场服务的功能,第三产业开始直接介入了生产过程。这就使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第三产业,将随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进入高速增长时期。第七,相对于经济总规模的人口数,依然显得过多,因而,实现充分就业,缓解乡村剩余人口的压力,依然将成为保持高速增长的初始动力,同时,发展就业率高的产业,仍然是新发展阶段的主要任务。

以上特征显示,90 年代初中期以后的中国经济,将进入比 80 年代更为复杂的时期。80 年代的经济增长,主要围绕工业化规模的扩大和消除与世界工业的差距来展开。今后的发展,则不仅要继续提高工业化率,还要围绕改善生活质量和在特定领域实现现代化来展开。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中,要从总体上明确界定中国应采取怎样的增长方式,或从总体上明确指明今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将依赖什么类型的生产要素来推动,都是相当困难的。当今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市场汇率计价只接近 700 美元(1996 年)。若采用购买力平价计价也只有 2000 美元左右(按 1 美元等于 3 元人民币计算),只相当于美国的 1/15;同时,以人口计算的工业化率,依

然处于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水平。然而,中国的发展又是非常的不均衡,80年代高速发展的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可以说已率先实现了工业化。其中,一些大城市,甚至已开始着手发展代表世界现代化水平的、知识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基础。这种区域的不均衡及产业发展的不均衡,必然要求今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采用多元的经济增长方式,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产业、不同的行业或不同的产品生产,采用不同的增长要素的结构组合。

实际上,任何增长方式或增长要素的结构组合,在动态的增长过程中,都具有切入技术因素或诱发技术进步的可能性。技术进步并不仅仅表现在用新的思维、新的原理和新的制造方法,所创造的更多凝结人类知识和技术的产品集合中,也表现在用新的知识和技术,来改进原有产品的工艺制造上。同时,对于大多数尚未达到规模收益不变临界线的产品制造来说,即使劳动与资本的结构组合不变,而仅是同比例增加,同样能带来由劳动与资本增加率所不能解释的总要素生产率的上升率。我们应该明确的是,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模式,在总生产函数中,只能被作为理论特例来看待。因为,人口的增长或消费频率的提高,会提高特定产品、行业或产业的需求总规模,由此诱使供给总规模的上升。而在供给总规模的上升中,则就具有采用更为专业化的社会分工的可能性,由此生成社会生产的组织效率。80年代中期,我国测定的经济增长中的技术进步贡献率,大约是18%左右,而10年后的90年代中期,其总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竟超过40%。显然,不可否认供给规模扩大所诱发的投资规模扩张,与社会分工朝更有效率的方向演变的作用。

按照纳波特对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方法,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是“要素(劳动力、土地及其他初级资源)推动的阶段”;第二阶段是“投资推动的发展阶段”;第三阶段是“创新推动的发展阶段”;第四阶段是“财富推动的发展阶段”。如果,我们将纳波特对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视为是力图将增长要素的特征,来反映发展阶段特征的一种方法,显然,他不同于亚当·斯密和李斯特,后者仅用增长方式所形成的产业结果来区别经济发展阶段的特征。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纳波特的概括至少可从当今发达国家的实践中,证明其前三个阶段及其逻辑递进,是合理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促成了“纳波特阶段”的更替?回答这一问题,对正确认识我国当今处于怎样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应在主体上采取什么类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是相当重要的。

纳波特在前三个发展阶段中,将经济增长的要素,归为初级要素、资本要素和创新要素。这样的归纳,实际与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增长要素的归类,大体相似。我们知道,任何生产方式,都是具有劳动知识和技能的人操作生产资料的结果。以此为分析起点,纳波特的前三个发展阶段中,都包含有三大要素共同推动经济发展的因素。只是他的分类,明确区分了在特定的发展阶段中,哪类要素的数量增减,将对经济边际增长,产生决定性影响。以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为例,第一阶段可界定为工业革命之前的时期,那时,劳力和土地对经济边际增长起决定性作用,以劳动工具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资本投入对边际增长的贡献相对较小,知识和创新对边际增长的影响,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并不显著。第二阶段可界定为工业革命至20世纪80年代,在这个阶段中,投资及其由此产生的资本积累,对经济边际增长起决定性作用;此时,劳动与土地的增减,在新生产方式中的作用相对下降;知识和创新将通过一定的时间周期,逐步影响劳动力和投资,但对经济边际增长的影响依然不大。第三阶段可界定为80年代后,在这个阶段中知识和创新不断创造能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产品与服务,同时对原有的生产方式,进行渗入新知识的创新改进,使经济的边际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转变为创新行为;劳动增减与资本数量增减的影响相对变小。

如果我们将“纳波特阶段”更替,放入以新古典理论为基础的总生产函数中考察,也许就能发现“纳波特阶段”呈逻辑递进式更替的原因。第一阶段主要采用农业生产的增长方式,当劳力和土地在总生产中作为变动要素时,处于总规模收益递增阶段的劳力和土地的边际生产率上升;当土地在总量上都被开发而成为固定要素时,在生产工具为代表的资本要素未发生重大变化时,边际劳动生产力便经历由增加则下降的过程,最后导致总生产进入总规模收益递减,和规模收益为负值的阶段。而重新引致边际增长,则需在资本形式上发生革命,这就产生了“纳波特第二阶段”——“投资推动的经济发展阶段”,投资推动创造了突破土地等自然条件限制的工业生产方式,形成了新的劳力与资本组合,当工业产品的需求极大时,总供给小于总需求使总生产中的劳力与资本,处于总规模收益递增阶段;当总资本规模持续增加使其边际生产力经历由增加到下降的过程,最后就将导致总生产进入总规模收益递减和规模收益的负值的阶段。而要重新引致边际增长,则需对传统的生产方式,从需求与供给两方面进行创新,这就产生了“纳波特第三阶段”——“创新推动的发展阶段”。

以纳波特经济发展阶段论为分析判断的依据,当今中国,从总体上只能说依然停留在投资推动的经济发展阶段。从总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水平上来判断,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与那些开始进入纳波特第三阶段的发达国家“启动”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相距甚远。在经验上,中国的投资推动仍留有相当大的上升空间。在理论上,我们可以说成是远未进入资本边际生产力下降的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也与理论判断相符合,首先,中国的农业,远未完成通过增加资本投入来实现资本替代劳动的集约化过程;其次,工业化率水平的低下,隐含着工业资本投资依然停留在边际生产率大于1的总规模收益递增阶段;第三,工业化深化后所诱发的快速提高城市化率水平的任务远未完成,城市社会资本投资和城市之间联系网络的社会资本投资,在中国才启动不久;第四,替代计划体制生产与流通服务功能的城市第三产业,对投资还存在极大的需求。在全社会的总生产中,资本的价格远高于国际市场,实际也可以证明,在中国资本的稀缺性。

因此,在经济发展新阶段中,我们所要寻求的增长方式转变,不是说我们已超越“投资推动的经济发展阶段”而进入“创新推动的经济发展阶段”,而应该是立足在“投资推动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如何更多地采用该阶段后期的推动经济增长降低资源消耗的技术,使技术进步更多地依附在资本投资之中来推动增长。如果我们将90年代前界定为大规模工业化的粗放型投资推动增长阶段,则经济发展新阶段是转变为集约型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阶段。后者与前者的区别是,不仅依赖资本总量扩张中来提高增长率,还要通过改进资本的质量、劳动的质量和管理水平的方式,来提高总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同时,在经济技术水平较高的行业,也可提前进入“创新”推动行业发展的阶段,特别是那些代表高技术发展趋势的行业

注: ①、②、③、⑤ 参见《1984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版,第308页;第27页;第30页;第365、374页。

④ 引自林子力《论联产承包责任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9月版,第106页。

主要参考文献:

1. 索洛等:《经济增长因素分析》,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2. 周振华:《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战略定位》,《经济研究》1996年,第10期。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研究所教授;单位邮编:200433)